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十二五”规划项目、国家出版规划项目

# 水稻在北方

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  
南方稻作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

曾雄生 著

《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研究丛书》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十二五”规划项目、国家出版规划项目

# 水稻在北方

《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研究丛书》

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南方稻作  
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

曾雄生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稻在北方：10世纪至19世纪南方稻作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 / 曾雄生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1  
(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研究丛书)  
ISBN 978-7-218-12902-0

I. ①水… II. ①曾… III. ①水稻栽培 - 农业史 - 研究 - 中国 - 10世纪 - 19世纪 IV. ①S511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7667 号

SHUIDAO ZAI BEIFANG—10 SHIJI ZHI 19 SHIJI NANFANG DAOZUO JISHU XIANG BEIFANG DE CHUANBO YU JIESHOU

**水稻在北方——10世纪至19世纪南方稻作技术向北方的传播与接受**

曾雄生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责任编辑：郑 之

封面设计：李桢涛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1.5 插 页：1 字 数：480 千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85240

# 目 录 | MULU

## 引 言 / 001

- 第一节 稻米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 / 001
- 第二节 关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 / 011
- 第三节 问题的由来 / 014
- 第四节 现有研究的检讨及相关概念 / 020
- 第五节 本研究的主旨、材料与方法 / 031
- 第六节 本书的结构 / 034

## 第一章 早期南北方稻作技术的互动 / 035

- 第一节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北传 / 035
- 第二节 新石器至先秦时代的北方稻作 / 041
- 第三节 汉唐时期的北方稻作及其特点 / 043
- 第四节 早期南方对北方稻作的可能影响：以《齐民要术》为例 / 049
- 第五节 南方稻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 053
- 第六节 南方农业技术中的北方因素 / 071

## 第二章 水稻技术引入北方的背景分析 / 080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080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085

第三节 文化背景 / 090

第四节 自然环境 / 094

第五节 技术背景 / 111

### 第三章 引入的主要经过及产区分布的变化 / 119

第一节 宋代河南河北的种稻活动 / 119

第二节 元代关于风土和畿辅水利的议论 / 126

第三节 明人在北方种稻的言行 / 128

第四节 清人关于北方种稻的争议 / 141

第五节 北方水稻产区的分布及其变化 / 162

### 第四章 传播的动力、途径与机制 / 209

第一节 晋祠稻：固有稻作传统对北方稻作的影响 / 210

第二节 京西稻：北方稻作发展的政治模式 / 237

第三节 小站稻：北方稻作发展的军事屯田模式 / 260

第四节 鲁各庄和蛮子营：宋元明清时期的移民与稻作 / 289

第五节 稻粱谋：士人在稻作技术传播中的角色 / 324

第六节 农书与耕织图：文本的作用 / 359

### 第五章 传播的阻力及障碍 / 386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影响：水旱之间 / 386

第二节 优势作物及生业的竞争 / 389

第三节 各方利益的冲突 / 414

第四节 文化认同与排斥 / 438

### 第六章 南方稻作技术在北方的传播与接受 / 442

第一节 农田水利技术 / 442

第二节 水稻品种 / 488

第三节 技术及农具——以《天启三年天津屯垦条例残卷》为中心 / 531

结论与讨论：南方稻作技术对北方的影响 / 579
第一节 历史上关于作物引种所引发的争论 / 579
第二节 水稻在北方：江南化 VS 土著化 / 583
第三节 明清时期北方稻作发展的三种模式 / 625
第四节 北方：水稻与小麦 / 626
参考文献 / 636
古籍 / 636
专著 / 643
论文 / 647
后记 / 654

# 引言

## 第一节 稻米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

### 1.1 稻米与中国人口分布

水稻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其地位主要体现在养活人口的多少。世界各大洲均有水稻栽培，亚洲占世界水稻播种面积的 90% 以上，美洲、欧洲和非洲也有少量水稻栽培。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水稻生产大国。明末宋应星估计，“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sup>①</sup> 这种格局的形成大致是在宋代完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南方水稻主产区居住着中国半数以上人口且以稻米为唯一主食；二是稻米在以粟麦为主食的北方人口中也占到一定的比例。

汉代时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江南地区基本上处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的状态。直到唐朝，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然而就在汉唐时期，北方战乱导致的人口南迁，加速了南方人口的增长，并给南方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终转化为南方农业开发的动力。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南北人口消长的转折点，北宋以前的人口是北方多于南方，北宋至今，南方多于北方。元丰八年（1085）全国户数为 14,852,684 户，江南合计有

<sup>①</sup> 宋应星：《天工开物》，钟广言注释，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1 页。

9,852,016户，约占三分之二。<sup>①</sup>

1935年胡焕庸在其“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绘制了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图中从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两地之间连接一直线，则此线的东南半壁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96%。西北半壁的面积占全国的64%，人口只占全国的4%。这条从东北至西南的分界线基本上和中国400毫米等雨量线重合，实际上也是东南半壁水稻和西北半壁粟麦的分界线。千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史主要就是水田扩充和水稻增产的历史。

## 1.2 稻米与中国南方人的生活

中国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但自从驯化水稻以后，便再也没有其他作物可以取而代之了。倒是原先食用的芋、木薯、粟、薏苡、菰米等作物，逐渐为稻米所取代。南方人食用稻米的习惯，对后来传入南方的一些作物，如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产生了巨大的抵制作用。因此，尽管宋朝以后，官方三令五申劝农种麦，但小麦的种植总是推而不广。明清以后传入的美洲作物，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等虽然对于农业的边缘地带开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客观上缓解了传统中国社会进入后期粮食的压力，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对于水稻主产区的影响相对有限。至今中国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仍然是在水稻主产区。

稻米从物质到精神对南方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较于其他作物而言，水稻种植对劳动力的要求很高。从整地、移栽，到中耕、除草和看守，每个环节都充满了艰辛。粒粒皆辛苦的稻米成为南方人一日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人们的幸福或辛苦全都来自稻米。水稻生产养成了农人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安土重迁、尊老敬老等性格。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要求人们一年四季固守在土地上去完成生产的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会对全年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有时他们依靠祖先传承下来的智慧，拼尽全力仍然不能确保粮食丰收，他们还要祈祷天地万物，祈求风调雨顺。人们深深地懂得一粥一饭来处

<sup>①</sup>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不易，懂得爱惜粮食，而尊老敬老也是稻作技术传承所必需。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依靠众人的力量去完成生产的全过程，这也养成了他们的集体主义倾向。但当这一切成为水稻生产的固有模式或常态之后，需要付出的艰辛劳动也成为其向外传播技术的一项阻力。

### 1.3 稻米与中国北方人的生活

原产于中国南方的水稻，其实很早就传入到了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只是北方种稻的历史时断时续，在区域分布上也成零散状态。在农业的早期阶段，水稻与粟、黍、菽、麻等同时栽培时，并不具有优势，相反在相对干旱的北方，水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自然条件的限制。源起于古代北方的“五谷”概念，最初是禾、黍、麻、菽、麦。明宋应星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sup>①</sup> 明代人心目中的西北指的就是中国北方。稻米在古代北方最初被排除在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之外，后来才加入到了五谷的行列。《吕氏春秋·审时篇》兼收禾、黍、稻、麦、麻、菽这六种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但稻米在中国北方人生活中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南方。北方人吃米（相对于全体人口而言）的机会不多，种稻的机会更少。

由于稻米在北方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稻在北方人的生活中处境似乎有点尴尬。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高贵，又似乎低贱。这使我们看到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餐桌上的稻米是食中上品，“非婚丧节令，恒不轻用”，可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却看到水稻在田野上消失。河北香河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曾以产稻著称。清初还有稻米产出，包括粳稻、糯稻、水稻和旱稻。但到民国时期，稻米生产已从本地绝迹，少量的稻米“来自津沽”<sup>②</sup>。而小米、玉蜀黍（玉米）、杂豆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品。“稻非土产，其价倍于面，故食者居其少半”，除政府机关，民间庆吊外，即使是相对富余的中产之家，也以食麦为主。河北“丰（润）人贵稻，然亦不厌黍与高粱（粱），有余之家多食稻，早膳必为黍与高粱食之，其贫家食稻，或转不习此。与齐鲁之人

<sup>①</sup> 宋应星：《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民国《香河县志》卷5《风土·民生》，第2b页。

嗜麦面无异也。”<sup>①</sup> 富裕人家吃稻米，而贫苦人家反而不习惯吃。沙河县民膳食以小米为主，当地不产稻米，不过在宴会时亦用之<sup>②</sup>。河间府故城没有水稻种植的记载，而河间县“朝夕饔飧，或以面炊饼，或小米、高粱（粱）作饭，粳稻则用以饷宾”<sup>③</sup>。山东博兴县也是如此，“土人非燕宾不以炊”<sup>④</sup>。河南密县洧河两岸均有水稻分布，但稻米饭“供祭祀、宾客之需，常食不轻用也”<sup>⑤</sup>。山西长子县产稻不多，“祭祀、宾客之用，惟取给于太原晋祠之貯来者。”<sup>⑥</sup> 河北宝坻“稻与粳，所收少，人恒惜之。”<sup>⑦</sup> 总之，稻米对北方人来说，不能没有，也不要太多。

北方人食稻的机会不多，能经常吃到稻米的人往往是富贵阶层。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古人将“食稻衣锦”视为“生人之极乐，以稻味尤美故。”<sup>⑧</sup>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山东沐河上游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人骨食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汶口晚期的食物结构存在贫富差异，富有者的饮食以大米等C3植物为主，普通老百姓的饮食以小米等C4植物为主。<sup>⑨</sup> 直到清代和近代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太多的改变。稻米的消费量在皇室和达官贵族的食物构成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乾隆皇帝甚至“无一日不食，无一食非稻”<sup>⑩</sup>。稻在皇家礼制中的地位也高于麦和其他的作物。在举行耕耤之礼时，户部官初进耒耜，次进鞭，次进皇上耕耤稻种匣，次进诸王耕耤麦种匣、谷种匣，次进九卿耕耤豆种匣、黍种匣。<sup>⑪</sup> 北方稻米的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大

<sup>①</sup> 光绪《丰润县志》卷9《杂记》，第29a页。

<sup>②</sup> 道光《沙河县志》卷3《风土·食货》，第3a页。

<sup>③</sup> 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第5a页。

<sup>④</sup> 道光《博兴县志》卷5《风土志》，第2a页。

<sup>⑤</sup> 民国《密县志》卷13《实业》，第2a页。

<sup>⑥</sup> 康熙《长子县志》卷2《物产》，第69a页。

<sup>⑦</sup> 乾隆《宝坻县志》卷7《风物》，第6b页。

<sup>⑧</sup> 罗愿：《尔雅翼》卷1《释草·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sup>⑨</sup> 齐乌云：《山东沐河上游史前文化人地关系研究》，《第4纪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0—588页。

<sup>⑩</sup> 《御制诗五集》卷62《稻香亭》，文渊阁四库本，第24a页。

<sup>⑪</sup>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44《礼部五》，第1页。

中城市。“都城百万户，籴太仓稻米食者甚多”<sup>①</sup>。近代山西的情况也是如此，“民间食稻者甚鲜，仅商业繁盛之地需之耳”，又“山西所产者，非纯属稻，有秔与糯。秔作饭及稀饭，为上流社会常食及一般宴客庆祝日所食用。糯米则制粉、蒸糕或供神用之。”<sup>②</sup>

但这种乾隆皇帝“无一日不食”和“上流社会常食”的稻米，却在普通的北方农村的日常食物中占极少的份额。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稻米消费的购买力，而且也是因为长期的食物习惯所形成的消费意愿不高。一方面，稻米作为珍贵的食料，用以待客；另一方面，普通人也不爱吃稻米。这多少有些吊诡。明末，当北方农民起义军一路南下，威胁江南的时候，代州人张凤翼便以“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饷江南草”为由来安慰桐城孙晋。<sup>③</sup>清初浙江人谈迁北游时看到，“北人饔飧，多屑麦、稷、莽为怀飮及粟饭，至速客始炊稻。市仅斗升。其价甚昂。土人亦不之种。密县超化寺前，一区二百亩始稻。”<sup>④</sup>近人齐如山提到，“北方吃大米的机会太少，近水之处，吃的还较多一些，若近山一带，哪有大米吃呢？就说吾乡一带，离水乡并不远，但稍贫寒之人，或中等人家，几乎是一年也吃不到一次，富家有婚丧事，自己前去帮忙，或者可以吃一次大米，否则虽过年过节，也是吃不到的。”齐先生也注意到，“北平吃米较多”，稻米的消费者主要包括旗人、官员阔人以及生活在南城南方官员。至于崇文门外一带之工商界人，或各城之商家，都是来自河北、山东、山西等省，也都是以面为主。贫苦工艺，则吃玉米面，偶尔解馋，亦只是吃面。他们说，大米口松，吃了不经时候，不久就饿，且远不及白面好吃。<sup>⑤</sup>

清代八旗兵丁所食之米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粳稻米五成，稜米（即南方

<sup>①</sup>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 149 《物产一》，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75 页。

<sup>②</sup> 民国《鲁豫晋三省志》，引自王达等合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 1 种《稻》（下编），农业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87 页。

<sup>③</sup> 《明史》卷 257 《张凤翼传》，第 6633 页。

<sup>④</sup>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314 页。

<sup>⑤</sup> 齐如山：《华北的农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9 页。

所产籼稻米)三成五分,粟米一成五分。养育兵统支稜米。<sup>①</sup>但最受官兵欢迎的是粟米而非稻米,尤其是南方生产的籼稻米更不受欢迎。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一月初二日,署理陕西巡抚史贻直、鄂昌,便因“大营官兵日用所需,必得颗粒圆净,煮食甘美”之粟米,而“楚省之稜米”“夏间潮湿熏蒸,成色业已稍减,又复自陕运至军营,道路迢遥,为时甚久,再经风霜雨雪,辗转搬运,必致成色更减,气味不佳”,“运至军营,断不适用”等原因,建议“将原议派拨之楚米五千京石,改拨粟米五千京石”<sup>②</sup>。一般情况下,八旗兵丁和官员都会将自己从官仓中该得的米换成钱票,买杂粮充食。“赴仓亲领(稻米)者,百不得一。”<sup>③</sup>由于稻米不受北方贵族和八旗兵丁的欢迎,有时政府便将本色改为折色,将发米改为发钱,让他们直接拿钱到市场上购买所需粮食。食物上的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在旧西藏也同样存在。普通藏民以青稞为食,不食小麦,但小麦制作的面条、包子在旧西藏对贵族和上层僧侣来说也是奢侈品。<sup>④</sup>

稻米并没有成为北方普通民众的主食,北方人也不习惯以稻米为主食。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皇帝下令将正在北运的20万石江西尾帮船粮截留在山东,赈济灾民,但黄炳却希望将此二十万之大米换成山东省应解之小米,理由是“东省民间食用,俱系小米,以及豆麦杂粮,蔀屋穷簷从不买食南方大米,即有富家宦户所用无几”。<sup>⑤</sup>也因为这个原因,山东境内虽有运河一道,可直达江广(指湖南、湖北、江西——笔者),而从无江广米商到境,盖缘山东民性食粟麦,而江广多产稻米,与山东民食性不甚相宜。<sup>⑥</sup>北方人不爱吃稻米,他们对食用稻米有很多的担心。这些担心都与稻有关,一是稻多

<sup>①</sup> 《嘉庆朝大清会典》卷18《户部·俸饷》,光绪朝版本,第2b页。

<sup>②</sup>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207下《硃批史贻直奏折》,文渊阁四库本,第9a页。

<sup>③</sup>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sup>④</sup> 强舸:《小麦怎样走上了藏族的餐桌?——西藏的现代化与藏族饮食文化变迁》,《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189页。

<sup>⑤</sup> 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29页。

<sup>⑥</sup>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167页。

产于炎热的南方，在没有形成消费习惯之前，容易产生肚胀烧心的感觉，因此，“北人不好食稻，每云食之病热。”<sup>①</sup>二是稻生于水，在传统的观念中稻米属寒性食物，因此，“北方之人，多不惯食稻，谓其性寒，且不耐饥。”<sup>②</sup>不耐饥是食物习惯所造成的一种感觉。习惯了以面食为主食的北方人，改吃同等数量主食的米饭，往往不到下一顿就饿了，同样以米饭为主食的南方人改吃面食也如此。无独有偶，以青稞为主食的藏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小麦种植的扩展，小麦与藏族食物习惯发生冲突，在藏族群众中出现了“别看小麦产量高，吃了腰疼，没力气干活，你拿小麦秆喂牛，牛都不吃，牛都要吃青稞秆。”<sup>③</sup>

其实，北方人不习惯食用稻米由来已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表现出他们对于食物的不同喜好，小米是彼时人们的最爱。到宋元时期这种习惯依然未改。宋仁宗嘉祐二年（1075年），薛向提点河北刑狱，仍兼提举便籴粮草。当河北大水，民乏食，诏辍太仓米六十万斛以赈之；向以为北人不便食秔，且漕路回远不时至，请出本司米四十万石以代之。<sup>④</sup>元时，来自北方的湖南戍军多疾，原因是北方的士兵“不习食稻”，于是便动用船只运送粟米若干万斛到湖南。<sup>⑤</sup>宋元以后，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北方人的主食，面食习惯的养成，成为北方人食用大米的又一障碍。到了南方的北方人，吃不上面食，只能勉强地进食鱼稻。宋人张耒有诗道：“我家中州食嗜面，长罗如船碇如电。烂银白璧照中厨，膳夫调和随百变。江乡种麦几数粒，强进腥鱼蒸粝饭。雪深麦好定丰登，明年一饱偿吾愿。”<sup>⑥</sup>宋室南渡之后，当时西北人聚集的临安（今浙江杭州），面食种类不下汴梁。仅蒸制食品就有五十多种，其中大包子、荷叶饼、大学馒头、羊肉馒头、各种馅饼、千层饼、烧饼、春饼等都是典型的

<sup>①</sup>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5页。

<sup>②</sup> 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547页。

<sup>③</sup> 强舸：《小麦怎样走上了藏族的餐桌？——西藏的现代化与藏族饮食文化变迁》，《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179页。

<sup>④</sup>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94页。

<sup>⑤</sup> 姚燧：《牧庵集》卷21，武英殿聚珍版，第11a页。

<sup>⑥</sup> 张耒：《雪中狂言五首》之三，《全宋诗》第20册，第13359页。

北方面食<sup>①</sup>。这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更是长期形成的食物习惯使然。对于普通的北方民众而言，不仅是没有多少稻米可食，而且是有稻米也不爱食。民国时期，河北张北县虽有“用米做饭，但常食之者甚少。”<sup>②</sup> 糯米也是如此，“北方种糯者极少，间或有之，但也是很少的少数，盖因此用项虽极普遍，可以说是各小乡村都能见到，但销项则不大。因为食此者，都是作为点心，而一日三餐之中，以此替代大米白面，作整顿食品者，则可以说是没有。”<sup>③</sup> 糯米主要用于包粽子、做八宝饭、爰窝窝、江米肉、年糕、元宵等，“都是临时应节的食品，平常则没有卖的。”用量有限。“乡间食糯米面所制之品就更少了，大概只有元宵一种。家庭中吃元宵，多半用黍子或黏高粱面。”

既然北方人不爱吃稻米，那么从唐宋以来，每年数百万石由南方流向北方的大米最终流向了谁人之口？从有限的资料来看，流入北方的稻米，其最终的消费者大多数可能还身在北方的南方人。其中，最多的是士兵。北宋时，开封城里就驻扎着来自南方的士兵，他们在保卫京师之外，还参加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水稻生产。此外，流入北方的稻米消费者还可能是来自南方的官员及其家属。王安石在《北客置酒》一诗中提到“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鞴稻饭随粱餧。引刀取肉割啖客，银盘擘脯与鲜”<sup>④</sup>，这里的食物及食用方式虽然还明显地带有北方的色彩，但却明确地提到了稻饭。大概是为了招待像王安石这样的南方客人所特意准备的。在东京的各级官僚，每月都可以领到数量不等的禄粟，其中“米麦各半。”<sup>⑤</sup> 京城官员所食稻米大多来自漕运，运输的过程中要使用到囊席，食用之前还要入白春去米糠。于是就有这样的故事。北宋时宰相兴化仙游（福建）人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有一天当蔡京问他们是否知道每天所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说“从白子里出”，另一个则说“在席子里出”。<sup>⑥</sup> 近人齐如山

<sup>①</sup> 周密：《武林旧事》卷6《蒸作从食》，知不足斋本，第12页。

<sup>②</sup> 民国《张北县志》卷4《物产志》，第19a页。

<sup>③</sup> 齐如山：《华北的农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sup>④</sup>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6《北客置酒》，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sup>⑤</sup>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3页。

<sup>⑥</sup> 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注意到，“北平吃米较多”，而北平吃米的人群中包括生活在南城南方官员，还有就是在北平从事其他行业的南方人。

南漕到京通二仓后，因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以米换钱，以钱买杂粮；官员俸米，也卖给米铺。由南方漕运到北方的大米，最终成了在北方的南方人的盘中餐。国家花费巨力将稻米从南方运抵北方，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进了在北方的南方人之口，且这个过程中难免造成各种浪费，甚至让人感觉有违漕运初衷。“自创设漕运以来，国家岁糜千万之款，设官置局，辗转兑运，输入京仓，以为天庾正供，京曹禄俸，皆仰给于此。而按之事实，有大相径庭者。”<sup>①</sup>

北方人对稻米的消费意愿不高，消费量也小，有限的消费量也多选用北方出产的稻米，鲜少食用南方的稻米。在北京，称南方籼稻米为“机米”，而北方出产的粳稻米为“好大米”。吃机米的人很少，而所谓“好大米”的供应又严重不足，直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民只有逢节假日才能每人2斤好大米供应。“北方的米为何比南方好吃？一位老农曾说，南方天气热，稻子生的快，老往外发展，发的太快，不能休息，没有攒力量的时候，他的粒实一定发松，口味自然就差。北方天气有时较寒，稻子生长的日期长，天热则发展，稍冷则休息，有力量的时候，粒实一定发紧，自然就好吃。”<sup>②</sup> 在北方，种稻的附加价值也很低，远不及高粱等农作物。稻草“在北方可以说是没什么用处，喂牲畜，牲畜不吃，作燃料亦不合用，因为他太少则不爱燃，多则冒烟。”<sup>③</sup>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在稻作相对发达的北京海淀区，稻农将稻草卖给种菜园子的农民，夹风障，用以保护地里的青菜越冬，因此，捆稻草成了当地稻农的一项特殊技能，因有“海淀三件宝：锔碗、筛土、捆稻草”<sup>④</sup>的说法。但这样的例子在北方并不多。

凡此种种，致使北方人的水稻生产积极性不高。如河北磁州人止知用糯

<sup>①</sup>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19页。

<sup>②</sup> 齐如山：《华北的农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sup>③</sup> 齐如山：《华北的农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sup>④</sup> 北京市海淀区水利学会：《情系京西稻》，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米作角黍，故种者亦少。<sup>①</sup> 河南阌乡县（1954年与灵宝县合并）境内南河地洼下，宜种稻，但为数甚少。惟麻庄、赵村、阳平、三川，有插秧种稻者，通计不过百分之一二。土人亦不惯（惯）食粥饭，只供包粽蒸糕而已。<sup>②</sup> 北方农民种稻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钱。收稻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手中的稻子卖掉换钱。稻成为一种经济作物。河南嵩县“稻虽产，非常需也”，“民日用不恒食，利其多易缗钱耳。”<sup>③</sup> 山东兗州间有梗稻种植，但“仅仅鬻贩，不能自食也。”<sup>④</sup> 从清末民初山西太原人刘大鹏的日记来看，当地的稻米价格（1600至1900文/斗不等）比玉茭、杂豆（近千钱）、谷米（千钱）、高粱（六百余钱）等高出不少，“种稻之家无不欣喜”。<sup>⑤</sup>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种稻肯定较之于种其他作物有利。但是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粮食种植首先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况且，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未必有利。因此，水稻在北方始终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由于北方种植水稻较少，北方都会，特别是北京，所消费的稻米主要来自南方。北京最长的胡同东、西交民巷，最初叫东、西江米巷。早在明朝万历以前，从南方运到北京的大米要在这一带卸运集散，南方的糯米又叫江米，这儿就叫了江米巷，成了一条以商品命名的胡同。

总的说来，虽然稻米在中国北方占人口少数的上流社会中有一定的消费量，且这一定的消费量可以凭借消费者自身政治、经济的优势，从外面获得满足。但对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北方人来说，他们既无稻米消费的能力，也无稻米消费的意愿。中国北方，稻米的消费者不是稻米的生产者，而生产者又不是稻米的消费者。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而本地的生产者由于稻米的消费意愿差，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稻米的积极性自然受到影响。其结果是北方的稻米消费要仰赖进口。近代华北的稻米每年输入数量极大，远超过华北地区的产额，北平、天津，济南和青岛等较大的都市消费稻米占总

<sup>①</sup> 康熙《磁州志》卷10《风土·土产》，第3a页。

<sup>②</sup> 民国《新修阌乡县志》卷9《物产》，第6a页。

<sup>③</sup> 乾隆《嵩县志》卷15《食货》，第1b页。

<sup>④</sup> 康熙《兗州府志》卷5《风土志》，第8a页。

<sup>⑤</sup>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第196页。

额百分之六十以上，来源地以华中华南为主，也有来自西贡（越南），日本或朝鲜。<sup>①</sup>

## 第二节 关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

北方和南方是个相对概念。广东人会将岭北的各省人称为北方人。中国地理上所说的北方与南方的划分，通常以淮河、秦岭为界。这是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也是旱作农区和稻作农区的大致分界线。以淮河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由来已久。《周礼·考工记》：“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显示南北之间在物产和气候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位于淮河北岸的河南确山县能够明显地感受南北间的这种差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曾在确山县任知县，他说，“确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sup>②</sup>但位于淮河南岸的凤阳，在历史上却一直视为北方。明人诸葛升说：“垦田在西北为利，而在凤阳一属，尤利之利者也。”徐光启也引述了这一看法。如果连凤阳都算西北，则北与南，简直足以长江为界线了。<sup>③</sup>

由于南北的划分并不固定，所以古人又常用“西北”和“东南”一词指代北方和南方地区。北宋末年，李彦等在京西汝州（今河南汝州）置局括公田，范围包括京西、京东、淮西等地，引发当地诸多的不满。史称“李彦结怨于西北”<sup>④</sup>。则北宋时的西北曾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南宋孝宗时“奖用西北之士”，京东兗州（今山东兗州）人尹檉、淮南宿州（今安徽宿州）人王希吕都因此受到提拔。<sup>⑤</sup>可见南宋时的西北泛指南宋领土以北的原宋代领土。明朝也是如此。徐光启《农政全书》多采用“西北”的概念。如在引述徐贞明

<sup>①</sup> 应廉耕、陈道：《华北之农业——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26页。

<sup>②</sup> 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sup>③</sup> 徐光启，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册《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sup>④</sup> 脱脱：《宋史》卷455《陈东传》，第13359页。